

20世纪30年代前后汉口自杀问题探析

——以1929—1931年《新汉口》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王 灿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20世纪30年代前后,是汉口进入社会转型的时期。在这一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里,不仅给汉口带来了进步与发展,也给汉口带来了诸多社会层面的问题,例如自杀问题。通过对这一当时汉口社会中“最危险之病态”的研究和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加深对当时社会转型期的认识,并提高我们对社会转型期所带来的突出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力。

[关键词] 自杀问题; 20世纪30年代; 汉口; 《新汉口》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2)04-0054-04

20世纪20~30年代是近代中国由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时期,在这个波诡云谲、新旧交替的时间段里,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思想、社会等因素所发生的巨变,也给诸多国人的生存状况和思维层面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影响无疑是极为深刻的。首先,它让国人接触到了新鲜的事物与认知,从而引导国人更为主动地去探寻个人与国家的未来之路;其次,它亦让一些受传统社会影响颇深的国人在社会心理层面与客观现实层面产生脱节,从而难以在这个相对全新的历史阶段立足。这样一来,诸多社会问题也接踵而至,而在这其中,自杀也成为了当时社会中“最危险之病态”^{[1]37}。同时,亦由于民众自杀现象的屡屡出现,就格外凸显了这一时期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严重性。近年来,亦有一些学者关注到了民国这一时期的这一现象,并展开了研究,但所研究的对象多为上海、平津等地。而笔者在对诸如《新汉口》等文献资料进行研读时发现,在当时的汉口亦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民众自杀现象,所以,笔者将在本文中对此一时期汉口的自杀问题进行论述和探讨。

一 自杀问题的出现及其特征

《新汉口》创刊于1929年,是由当时汉口特别市政府秘书处第五科负责编辑,主要刊载与汉口市政建设各方面相关的文章,内容主要包括有:市政规划信息、市政决策信息、户籍更替信息、卫生检疫信息以及人口出生、死亡统计信息等。笔者在通过对

《新汉口》1929年7月至1931年5月各期中所提供的自杀数据统计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一时期的自杀人数之多、自杀人数增长之快以及男女自杀比率之高等现象让人咋舌。

从表1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新汉口》杂志从1929年7月开始对汉口地区自杀状况进行统计到1930年6月这一年的时间里,自杀人数趋于稳定,但是从1930年7月开始到1931年5月,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比上一年的数据多出一倍有余。以至于在1930年7月及其之后各期所发行的《新汉口》杂志中特别划拨一个版块用以充作“本市之自杀统计”,对汉口地区自杀现象进行了极其仔细的数据分析,这是前面已发行的各期杂志中从未有过之举,而这也充分表明了自杀人数的激增不仅引起了执政当局的重视,并认为当前“种种自杀之事实,此实为目前极应注意之事,而应予以未雨绸缪之补救也”^{[2]13}。

表1 1929.7~1930.5 汉口自杀人数统计,单位:人

| 年份 | 自杀人数 | 男性 | 女性 | 男性比率 | 女性比率 |
|---------------|------|----|----|-------|-------|
| 1929.7—1930.6 | 71 | 43 | 28 | 60% | 40% |
| 1930.7—1931.5 | 147 | 86 | 61 | 58.5% | 41.5% |

(一) 女性自杀者比例极高

从男女自杀人数比例上来看,女性自杀者的比例也远高于同期其它一些国家的基本比例。“寻常欧美国家男女自杀比率是男性占65%~75%、女性

占 25% ~ 35%”^{[2]38},而从表 1 中所示,女性自杀比率高达 40% ~ 41.5% 左右。除去众所周知的女性生理、个性原因,封建礼教的束缚实际上在民国建立十余年后仍未散尽,诸如贞操守节观念、三从四德、生子传宗等等都成为了束缚女性家庭中地位的枷锁。再加上在一般家庭中,多数女性在家中几乎没有经济贡献,甚至有言道,“99% 的女性都可以说是无业者”^[3]。因此,女性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往往会处于家庭纠纷被训斥和指责的对象,于是,长期积压的怨愤无处宣泄,唯一一死了之。例如,在 1930 年

7 月的 26 件自杀案例中,有一些案例极为典型:年仅 30 岁的李氏因丈夫在外狂嫖,苦劝其夫毫无效果,遂怒而吞烟^①自杀;同样年仅 30 岁的杨王氏因丧子而投江自沉,不幸毙命;60 余岁的王余氏甚至只是因为丢失了一只家养的小鸡,就被丈夫严辞训斥,导致她一时想不开,就吞烟自尽。这样一些例子既充分表明了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和当时女性常受男性压迫的现象,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女性因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所导致的眼界狭小、思维闭塞的客观现实。

表 2 1929.7 ~ 1931.5 汉口自杀者年龄统计

| 年 份 | 20 岁以下 | 21 ~ 30 岁 | 31 ~ 40 岁 | 41 ~ 50 岁 | 51 ~ 60 岁 | 61 ~ 70 岁 | 71 ~ 80 岁 | 年龄不详 |
|---------------|--------|-----------|-----------|-----------|-----------|-----------|-----------|-------|
| 1929.7—1931.5 | 15 | 63 | 44 | 28 | 17 | 13 | 5 | 33 |
| 所占比率 | 6.9% | 28.9% | 20.1% | 12.8% | 7.8% | 6% | 2.3% | 15.2% |

(二) 青壮年自杀者占多数

从表 2 的统计来看,除却年龄不详的自杀者,40 岁以下的青壮年乃至少年自杀者比例高达 55.9%,这无疑是十分惊人的。而表 3 也反映出在汉口自杀的民众中囊括了五湖四海的各路移居者。作为一个当时有着“东方芝加哥”之美誉的大都市,九省通衢的汉口拥有着极为发达的工商业基础和极为便利的交通条件,这也使得各地民众纷至沓来。都市发达的结果,就促成了人口大幅度地集中化,但是这也会造成人口过剩、竞争更为激烈、谋生日趋艰难等问题。汉口作为国际化的都市,在吸引了众多年轻劳动力和求学者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城市居民年龄结构发生了改变,因而青壮年自杀者所占比例之高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其中,青壮年失业者和无业者的自杀主要是因为生计困难、衣食无着,甚至于像 1930 年 7 月籍贯鄂城的失业者鄢成进那样,携妻一同悬梁自尽的亦不在少数,由此可见时局不稳、制度缺陷给当时平民百姓带来的深刻苦难。而从那些自杀者中的青年学子和女性的自杀原因来看,两性关系和婚恋感情一旦出现问题,也会造成他们本就不算稳定的思维状态,就会激起青年人固有的冲动情绪,从而进一步引发悲剧的产生。

表 3 1929.7 ~ 1931.5 汉口自杀者籍贯统计

| 年份 | 武汉本地 | 省内 | 外省 | 外籍 | 不详 |
|---------------|------|----|----|----|----|
| 1929.7—1931.5 | 76 | 53 | 46 | 3 | 40 |

(三) 自杀方式选择背后的心理与社会因素

从表 4 统计出的自杀者所采用的自杀方式来看,亦反映出一些心理层面、地域层面的社会问题。

一般来说,自杀者都有共同的心理:第一,在生命消亡时,能够越快越好、越少痛苦越好;第二,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中国人在死后也希望能够保留全尸,完整地来、完整地去;第三,既然选择了自杀,那自然是以死为目的,因而自杀方式的选择也自然以最省事和便捷为主。那么,综合来看,汉口作为九省通衢之处,市内湖泊众多,尤其是长江,由于其水面宽广、不易施救,并且一些自杀者在遗书中也表明他们欲以“长江之清洁,以昭自我之清白”^[4],因而投江自沉就成为汉口地区自杀者的首选方式。另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杀方式选择排名第二的是吞烟,而且,根据《新汉口》杂志对自杀者身份、职业所进行的调查发现,不少吞烟自杀者皆是不甚富裕的平民百姓,这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作为重要通商口岸的汉口地区中鸦片祸害的严重性。

表 4 1929.7 ~ 1931.5 汉口自杀者采用的自杀方式统计

| 年份 | 投江 | 吞烟 | 自缢 | 自刎 | 服毒 | 枪击 | 不明 |
|---------------|----|----|----|----|----|----|----|
| 1929.7—1931.5 | 87 | 66 | 34 | 10 | 7 | 5 | 9 |

二 自杀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

这些自杀者为何要选择自杀,在前文中,笔者曾简要地概述了些许因由,但是综合来看,当时社会中自杀者的层出不穷的背后还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多方面原因。

(一)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失范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曾认为个人的自杀行为与整个社会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社会整合力

的强弱则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群体成员的个人意志。虽然中华民国在1928年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政治局面似乎得到了好转,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期,时局发展依然呈现出一副混乱与不安交错并行的景象。因而可以说,此时的民国政府缺乏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规范引导和约束,这不仅导致了极为严重的社会不公、巧取豪夺等多重社会分配层面的问题,也导致了个人层面的社会认知、价值观以及人生观的偏差与误解。与此同时,当时汉口地区物价

也是颇高,甚至于有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高呼:“在上海的时候,以为汉口终觉是内地,生活必定比较上海容易。来了汉口以后,始知大谬不然,多种物品,价格还要比上海贵,就是房租一项,亦不见得比上海便宜在那里。”^[5]如此一来,在社会规范的缺失、社会分配的失衡以及物价的高居不下的基础上,一旦失业,那么个人的心理防线几乎就是趋于崩溃,从而就会促使其走上绝路。

表5 1929.7~1931.5 汉口自杀者身份统计

| 年份 | 失业、无业者 | 学生 | 军人 | 政界 | 商人 | 工人 | 农民 | 教育界 | 不明 |
|---------------|--------|----|----|----|----|----|----|-----|----|
| 1929.7—1931.5 | 84 | 33 | 9 | 6 | 8 | 17 | 18 | 6 | 37 |

(二)社会舆论以及西方自由化、个人主义社会思潮的影响亦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笔者通过对当时汉口系列报刊的阅览发现,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报刊对于自杀的报道并不是特别关注,即便是有所报道,也是一些类似于“自杀之奇异情形”、“自杀者赤身浮江”等等这样充满噱头的仿如在编写小说般地报道。为了迎合大众猎奇心理,也为了使自身更加有利可图,如此这般报道形式不仅让前人之举为后人所学,也对整个社会风气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另外,由于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来到以及汉口是较早设立西学的城市之一,因而在汉口求学的学子也较早地接受到了西方思潮的影响。而诸如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思潮的传入,也使得一些学子沉湎其中,就让他们在社会纷乱、感情不顺时产生了悲观情绪,个人主义思想在此时占据上风,进而就导致了悲剧的产生,例如在

1930年7月至9月期间,就有近10名学子或因厌世、或因失恋而自杀。

(三)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传统思想,也是引发自杀悲剧的重要原因。

尽管民国一再宣扬废除传统封建思想,但即便是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这样大规模、狂飙式的思想解放运动也不可能瞬间将几千年以来的封建残余扫除干净。通过表6,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因为婚姻不幸、家庭纠纷等因素而自杀的人不在少数。尽管民国时期男女之间、家庭之间平等化趋势已趋明显,但是由于社会局势的不甚稳定,也导致了封建思潮的一再反复。因此,诸如因丧夫、不愿做妾、妻妾争宠、自由恋爱被制止而自杀的事例比比皆是,当然,亦有时人认为这些女性、青少年自杀是对不平等的封建压迫的一种抗争,但是新潮流与旧传统之间强烈的冲击所给人带来的苦闷与困顿也着实值得我们深思。

表6 1929.7~1931.5 汉口自杀者原因统计

| 年份 | 生计困难 | 口角纠纷 | 婚姻 | 失恋 | 畏罪 | 负债 | 疾病 | 私情败露 | 被虐待 | 厌世 | 不明 |
|---------------|------|------|----|----|----|----|----|------|-----|----|----|
| 1929.7—1931.5 | 76 | 21 | 21 | 30 | 4 | 4 | 5 | 4 | 4 | 8 | 21 |

(四)作为客观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环境,或许也是一些民众选择自杀时机时的重要原因

作为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季节因素,无疑是值得我们极为注意的地方。李大钊在谈及自杀问题时曾认为夏季是“自杀季节”,因为夏季太阳的光线极为强烈,进而就会十分“刺激人的神经,挑拨人的感情,足以扰乱人心的安定,使人的心理上精神上起一种变化。在这个时候,凡是生活上失意的人,绝望的人,或是对于人生问题怀疑的人,对于社会现状苦闷的人,往往被诱到死路上去。”^[6]武汉地区历来就有“火炉”之称,夏季之炎热让人烦闷不

堪,而综合一九二九年七、八月和一九三〇年七、八月的自杀者人数来看,有近90人选择了在夏季自杀,而且同时期的上海、广州等地的自杀者统计中,也是夏季为最高^[7]。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炎热的季节对人的心理影响。

三 余论

自杀是一时思想冲动的结果,更是一个处理起来十分棘手且影响恶劣、性质严重的社会性问题。自杀现象的频繁发生也引起了汉口地区社会层面对于加强构建自杀预防、自杀救济等社会机制的认真思考和实际行动。

(一)舆论媒介方面的举措

《新汉口》作为一种市政期刊,在 1930 年 7 月之前,它仅仅只是将自杀归于“命案统计”这一版块之中,对其的报道也只是局限于自杀者的人数,但是到了 1930 年 7 月时,《新汉口》杂志社发现自杀人数大幅增加,于是就开辟一个版块,作为“本市自杀之统计”用,并对其进行多期、长时间的连续性关注。不仅是开辟版块,还从自杀者个人方面进行统计、调查,并对自杀现象进行分析。在 1930 年 9 月份这期《新汉口》的“本市自杀之统计”版块中,编辑还加大主标题、副标题字体,凸显自杀人数的增加,并在副标题“青年、女性自杀者居多”之下打上两个感叹号,以示警醒。与此同时,在“本市自杀之统计”版块中,编辑从呼吁社会大众对自杀现象多多关注逐渐转型到对自杀现象进行较有深度的评述,而且语气、措辞也是愈来愈重。例如:在 1930 年 10 月份的《新汉口》“本市自杀之统计”版块中,编辑分析了自杀者的三条主要自杀原因,并认为他们“其情固可怜,其愚则不可及矣”^{[1]47}。而到了 1930 年 11 月份,由于自杀情形依然未有较大改观,且青年因婚恋而自杀情形尚有上升之势,故而编辑着重指出:“青年自杀,是极可鄙的下流行为,是社会的罪人,因婚恋而自杀的青年,应该把人生看得更高贵”^[8]。对自杀的分析愈来愈全面,对自杀行为的评述语气愈来愈重,也充分表明了作为《新汉口》背后所代表的市政官员对于自杀问题的态度,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汉口地区民众对于自杀问题的认识。

(二)市政机关方面的举措

汉口市政机关在认识到自杀问题的严重性后,

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进行预防和救济。例如,在长江附近树立“严禁投江自杀”等标牌,并组织人手定时在长江附近进行巡逻,借以预防投江自杀的情形发生,同时还颁布了一些关于禁烟(鸦片)的政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防吞烟自杀的情况;另外,一些热心市民也积极参与到自杀救济的工作中,一些自杀者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些热心市民的及时救助,从而得救。然而,总的来说,面对急剧转型的社会现状,汉口市政机关所采取的系列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终究显得过于被动。时局的不稳定以及社会制度的缺陷,并无法使这些自杀预防和救济机制能够更好地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应,特别是在经历了 1931 年汉口夏季那场大水后,普通民众的生活愈发困苦,而这些措施也就愈发显得徒有其表、名不副实了。

注:

①即吞食鸦片自尽。

[参考文献]

- [1] 本市之自杀统计[J]. 新汉口,1930,2(5).
- [2] 本市之自杀统计[J]. 新汉口,1930,2(3).
- [3] 本市之自杀统计[J]. 新汉口,1930,2(4):35.
- [4] 一封投江者的绝命书[J]. 新汉口,1931,2(7):23.
- [5] 立庵. 都市生活问题[N]. 市声周报,1927-01-23(5).
- [6] 李大钊. 青年厌世自杀问题[N]. 晨报周年纪念增刊,1919-12-1.
- [7] 鲁克霞. 民国前期自杀问题研究之探析(1912~1930)[D]. 苏州: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 [8] 本市之自杀统计[J]. 新汉口,1930,2(6):34.

Explore the HanKou Problem of Suicide in the 1930s

—With 1929 ~ 1931 “New Hankou” magazine as the research center

WANG Can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bei Wuhan 430074)

Abstract: Before and after 1930, Hankou enter a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In this period of rapi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t brought not only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but also many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suicide. Through exploring “the most dangerous of sickness” of Hankou, we can further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ety transition, and improve the prominent social problem-solving ability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suicide problem; 1930s; hankou; “New Hankou”